

中国经验与乡村现场

——解读长篇小说《双龙村纪事》

刘 畅

真实的中国沉潜在历史的表象下,而土地是它的根系和血脉,发现中国首先就是要发现一个乡土的中国。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双龙村纪事》再次将视野放在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农村改革初期的时间跨度内,从社会变革、文化积淀等不同的层面重新书写农村改革的前景和艰难。与大多数作家的专业身份不同,作者谢若武不是专业作家,而是从事了几十年农村工作的基层干部,是这场农村改革的亲历者和农村政策的执行者,这一身份使这部小说在重现农村历史现场的同时,试图揭示其中蕴涵的深层次矛盾,以理性的姿态把握时代巨变下农村社会的运行轨迹。

“乱”和“变”:乡土的非常态

《双龙村纪事》的叙述焦点是以双龙村为中心的乡土社会在改革中的命运变迁。农村生产制改革将农村生产力从大锅饭的集体模式中解放出来,而社会的逐步开放和新价值观念的出现逐渐将农民从对土地的依附中抽离出来。小说对这一时期农村社会环境的叙述展现了一种新力量的萌生,它具有旺盛生命力但又狂野而无节制,在两重向度的交夹下呈现出纷繁杂乱的景象。

一方面,改革带来了农村的“新”和“变”。波及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改革潮流打

破了农村封闭僵化的状态,劳动力和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为农民改变自身命运创造了巨大的机遇,正如穷苦的老农孙老健对包产到户的评价——“自由”,正是这种自由使孙老健终于看到了从土地里发家致富的希望,也正是这种自由让孙行孝、孙大牛等富于经济头脑、善于把握机会的年轻农民有了创业成功的可能。在这些人物身上,在农村生活场景的变化中,小说展现了这一历史转折期乡土社会活跃、进取的社会氛围。

因此,宗法乡村本能地捍卫着等级秩序的稳定,任何违背宗法伦理的行为必然要遭到抵制和攻击,孙子成与张霞芳的爱情便处在这种世所不容的境地中,孙德寿、孙子彪和孙子成的冲突也来自于宗法文化对新观念、新思潮的排斥。但包产到户的生产制改革赋予了农民生产的自主性,社会的流动性和市场观念的出现削弱了宗法文化的根基,传统伦理与宗族观念面对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农民自我意识的苏醒逐渐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其结果是,孙德寿在现实面前感到了悲哀和无力,变革中的双龙村似乎遗弃了他,“天道变了”的嘶吼成为旧秩序的挽歌。

另一方面,这一场改革对乡土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农村改革的具体进程和运行轨迹暴露出的问题和缺失直至今日依然有反思的价值。改革初期农村发展的失范使

之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一种无序和恶性的状态,这是小说叙述的重点之一——潘副专员和关上武等官员以改革为名捞取政治资本,好大喜功地追求政绩,以孙子彪为代表的投机者则把改革变成个人不择手段攫取财富的契机,乡镇经济也因此混乱无措中面临困境,而孙子成试图扭转这种局面的构想现实的种种干扰下一再碰壁。小说通过描述农村改革中出现的这些负面现象,展示了浮躁功利的社会现实对农村改革的阻碍,由此作者将视阈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延伸到农村的制度改革和观念革新上。

在以官本位文化为主体的乡村政治文化思维中,人物的行动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政治的左右,《双龙村纪事》通过刻画杨思超、关上武等干部形象及其权力博弈,显现了乡村权力斗争下农村改革的艰难:杨思超是一个具有政治远见和反思精神的知识分子型官员,支持孙子成的“胆大妄为”,但他同时也受到官本位文化的侵蚀,对潘副专员的好大喜功采取了投其所好的态度;关上武则是一个霸道贪权又惯于欺上瞒下的政治流氓,却得到了潘副专员的赏识,最终获得了提拔,孙子成在双龙村分田到户遭到他的打压,但当政治风向转变后,他立刻改变立场来追赶潮流,急切地制造着政绩。孙子成的创业始终被置于在杨、关的权力角逐中,而权力的变换使他一次又一次成为牺牲品,在急功近利的政治氛围内孙子成的成败一定程度上是由上位者的好恶决定的,对政治权力的过度依附传达出农村改革无法回避的问题,即权力阴影下官本位文化所造成的制度性缺失对农村改革进程的消解作用。

在直面农村改革的风云变幻时,作者塑造了孙子成这样一个新农民的形象:他有知识、有远见、敢想敢干,但也有着冲动和浮躁的性格弱点,是社会巨变过程中农村的希望,同时也是一个在新旧交替时期伤痕累累的生命。在小说的结尾,孙子成提出以入股

的方式发展社办企业,这一管理方式触动了公社书记蔡安平等人狭隘的公有制观念下改革的底线,于是在理想再次破灭后,他不得不含恨出走。如果说他与孙德寿、孙子彪、关上武等人的角力凸现了农村改革的艰巨和复杂,那么他的悲剧性的人生经历还在于当阻碍改革的表层因素——乡村宗法秩序和政治斗争的干扰——被清除之后,长期以来政治性话语环境滋生的旧观念依然抑制着对改革的体制性思考,因此孙子成的失败表明,在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体制为主导的框架内难以实现根本性的改革,这也正是新时期以来农村改革不断深化的起点。

文化视野中的乡村本相

从80年代的“文化寻根”思潮开始,新时期小说一直没有停止对乡土文化的探寻。溶入血脉里的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着不同历史阶段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而构成了乡土中国的生活现场。在某种意义上,发现乡村就是要发现存在于乡村表象下的文化积淀,于是展示乡土文化生态及其对乡村社会的作用力成为新时期乡土小说呈现出的较为普遍的写作趋势。对乡村的文化结构和文化观念进行解读和反思,使农村叙事深入到社会文化心理的潜在层面,更加完整地还原了乡村社会的真实面貌,尤其是从现代视野反观传统文化往往呈现了作者对现代化进程的忧虑和思索。

《双龙村纪事》中的双龙村是中国传统宗法文化的映射。在这个村庄的历史想象中,象征着儒家理想人格的文天祥被神化为文公菩萨而受到敬奉,小说描述了双龙村为文公菩萨举行开光大典与祭祖的场景,在仪式前后村民所表现出的庄重和迷狂反映出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宗法文化在双龙村根深蒂固的影响。对文公菩萨的膜拜,双龙村村旁的小溪被命名为清官溪,这些事件反映

出乡土社会对以忠臣清官为表征的儒家道德的崇仰,忠孝仁义的伦理规范在宗法文化的守护者孙德寿、孙老义等人身上得到显现,而他们也正是在这一规范下掌握着乡村社会的话语权。凭借着辈分高、儿子多的宗族意识和遵循礼义的形象,孙德寿成为宗法乡村的权威,而在传统文化塑造的氛围内村民自发地认同他的地位。因此,只有孙德寿和代表了基层政治权力的大队支书洪顺才能在开会时坐在孙氏宗祠正堂的楠木椅上,而生产队长只是由抓阄选出的傀儡,这是一个奇妙的隐喻,宗法制度和基层政权的力量共同组成了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

数千年来,宗法意识顽强地植根在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维系乡土秩序的集体无意识。正是在这种无意识的作用下,孙子成竞选生产队长、搞副业、罔顾同村不通婚的村规与张霞芳恋爱等离经叛道的行为被看作是对伦理规范和等级秩序的挑战,受到了以孙德寿、孙老义、孙子彪等人为代表的农村宗法势力的抵制,成为双龙村里的“孽龙”和“不忠不孝”的逆子。

从乡村的常态看,中国宗法社会的乡村政治文化特点是官民自治的传统,“‘官民共治’使乡村社会成了国家权力与民间权威的交汇地带”,乡村政治文化形成了伦理、宗族约束下的乡绅自治的特点。^①然而,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转变消除了乡绅存在的基础,土地改革以来,地主阶级作为整体已经在经济和政治上被彻底消灭,从合作化运动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强化也用集中统一的管理模式试图消化民间权威的统摄力。但在这一过程中,农村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和自我修复能力推动了一个新的群体填充基层权力结构的真空,宗法文化的同化力和阶级政治结构自身的缺失造成了“新乡绅”的出现。孙德寿和孙子彪父子是“新乡绅”的典型:在强调阶级血统的历史语境中,良好的阶级出身赋予他们政治优越感和参

与权力分配的合法性,而宗法权威的地位则使其获得了与政治权力直接对话的可能,同时基层政权的运作也离不开他们对乡村事务的熟稔和实际操作能力,于是孙德寿们顺理成章地成为农村权力结构的中心。

对孙德寿父子的文化解码,最终指向的是这一群体在社会转型中的命运变迁。显然,对于孙德寿来说,环境和观念的巨变蕴含了瓦解乡村政治文化基础的张力,他也因此被边缘化。而对于孙子彪来说,“新乡绅”的文化生态是他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必要条件,尽管作者以看似“恶有恶报”的情节模式终结了这一人物,但是随后乡干部们面对社办企业危机时对孙子彪的怀念暗示了这种文化生态的坚硬。

作者对农村生活现场的理性把握,不仅表现在他对宗法文化和特定时期乡村政治文化的透视上,也表现为民族历史文化在乡村社会中的多元呈现,这包括地域文化背景下的风俗场景和传统佛道文化的神秘性体验。小说细致描写双龙村这个南方山村的年俗、婚俗等乡间民俗画面,作者以具有乡土气息的语言叙述了年夜饭、拜年、开光大典、“吃众家”等乡村民俗活动的细节,并通过渲染双龙村的尚武风气和设置孙子成、孙子彪等人的比武场景展示了乡土社会狂野、强力的气质,使江西农村的地域文化特色跃然纸上。

在对社会文化结构的审视中,作者看到了宗教文化在土地上的生命力。小说中出现的古寺和老僧弘尘,仿佛是独立于人世风云之外的旁观者,神秘的谶语总是在孙子成陷于人生抉择时若是若非地负担起解谜的功能。这一脱离主线的情节,营造了禅宗文化氛围内写意、冲淡的文本情境,与山下紧张激烈的叙事语调形成对比,使小说在拈花微笑和剑拔弩张之间张弛有度,也显示了作者对深入乡野的禅宗文化的深刻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弘尘式的高僧奇士在新时期小

说中屡见不鲜,他们的共性是洞察世事的预知能力、特立独行的处世态度以及对事件模糊含混的言说方式,这一人物类型的出现来自于作家对传统文化的非理性认知和对乡土中国复杂文化现象的多角度开掘,这无疑拓展了乡土叙事的广度和深度。

真实的乡村建立在乡土文化的多元生态之上,在包容性极强的文化结构中,不同文化观念的相遇形成了长期以来支撑和制约中国农村的社会心理和文化语境,在面对社会转型时期的宏大历史场景时,作家文化意识的苏醒促使他们从更为广阔、厚重的民族文化视野表现和反思发生在土地上的这一场变革。

乡土:书写的困境

在以文学形式构建的乡土世界里,“现代”与“城市”成为笼罩在田间山际挥散不去的阴霾,面对城市的扩张和现代观念的侵袭,农村和农民群体的弱势地位背后是乡土文化日益逼仄的生存空间,“城市的排斥和乡村的胆怯构成了一个相反的精神向度:乡村文化在遭遇城市屏蔽的同时,那些乡村文化的负载者似乎也准备了随时逃离。”^②这也正是《双龙村纪事》的作者看到的在“现代”的浮华以外冷落的乡村,他在小说的后记里写道:“今天我所看到的乡村是被城市日渐

一日地边缘化了,而农民自身也正在不断地将自己边缘化。”

乡村社会的危机带来的是作家对此的真切关注,近年来的乡土小说更多地将视野置于当下,力图勾画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在困守和出走的不同选择中所面对的生存处境,从农村/城市、传统/现代的冲撞里寻找生长在土地上的坚韧与沉重。但是,多元、纷乱的现实正在肢解我们对整个社会的认知,走向城市的作家们也渐渐远离了农村生活现场,支离破碎的生活表象是当前文学作品中呈现出来的农村图景。在绝大多数作品纠缠于琐碎生活的断片,回避思考的深度时,我们已经失去了对乡土中国这一宏大对象的整体把握能力。

因此,当“现在”变得难以言说,回到历史原点也许是文学的无奈的选择。对历史的回溯,是要从源头上审视农村改革带来的生机和弊病,而后者成为无从逃避的因袭的重担,加载在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构成了与当下现实状况的因果关系。从改革的起点出发,去发现乡土中国的文化形态和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环境带给农村改革的希望和痛苦,我想,这就是《双龙村纪事》的价值所在,尽管略显平实、传统的叙述手法使这部小说未必能成为市场的宠儿,但它对时代的忧患和思考却正是时下文学所需要的。

刘 畅 上海师范大学

注释:

① 骆正林:《中国古代乡村政治文化的特点》,《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② 孟繁华:《风雨飘摇的乡土中国》,《南方文坛》2008年第6期。